【史学博士论坛】

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

刘方玲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清初帝王对于孔门后裔衍圣公的优礼，祭孔仪式中衍圣公不可或缺的参与，使得清初作为外来政权的祭孔仪式具有了正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清初政权的道统形象。然而，清初政权对衍圣公优待的同时，又设法加以约束，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特别是衍圣公向清初政权的主动靠拢，其实质表明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关键词] 衍圣公；祭孔；政权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10）01－0079－04

历史上，孔子多数时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自汉朝起，历代王朝都尊崇儒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被冠以种种头衔，其嫡系子孙也多受礼遇，享有特权。唐玄宗时，封孔子三十五代孙为文宣公；北宋至和二年（1055 年），“以直集贤院祖无择言，不宜以祖之美谥加其后嗣，乞别定封号，于是诏改封宗愿为衍圣公。……以迄国朝，皆相沿无异。”[1](卷一八)孔子形象及其后裔在宋代以后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崇礼，包括提高拜谒孔子的礼仪规格、增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封其后裔为衍圣公等等。即使是在政权纷立，或是外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各朝君主仍然争相立孔子后裔为衍圣公。据《辽史·义宗倍传》，神册元年（916 年），辽太祖立义宗倍传为皇太子。“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2](p.1209)北宋覆亡后，康王赵构南迁重新建立南宋政权，令当时的衍圣公孔端友同行，即家于浙江衢州而形成日后的“孔氏南宗”。同时，金人也在曲阜另立孔端友之异母弟孔端操为衍圣公，形成了南北宗衍圣公并立的局面。在蒙古帝国南下入侵，与金、南宋并存三足鼎立时期，甚至出现过三位衍圣公并存的局面[3](pp.220－222)。清初政权相当程度地维持过去王朝的衍圣公制度，并有所创新，特别是作为外来政权，清初对衍圣公的种种优礼更有其不同以往的意义。

一、清军入关和衍圣公的主动合作

明朝初年，元朝册封的衍圣公对明朝意存观望，“元国子祭酒孔克坚来朝。先是大将军徐达至济宁，克坚称疾，遣其子希学见达于军门，达送希学赴京，希学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见，上乃以勑往谕之曰：‘朕闻尔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子孙非常人等也，故历数十代往往作宾王家，岂独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至思之！’会克坚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勑使，拜命惶恐，兼程而进，既至召对谨身殿。上从容慰问曰：‘尔年几何？’克坚对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尔年虽未耄而疾婴之。今不烦尔宫，但尔家先圣之后，为子孙者不可以不务学。朕观尔子资质温厚，必能承家。尔更加诲谕，俾知进学，以振扬尔祖之道，则有光于儒教。’”[4](卷三一)这里，朱元璋一方面对衍圣公采取优礼，但另一方面，还对其称病不进见的态度予以警告，作为道统象征的衍圣公不能对抗，只能“拜命惶恐，兼程而进。”

明清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衍圣公孔胤植吸取了其先祖孔克坚的教训，采取了一种积极谋取与新政权合作的态度，不独是后来对清政府如此，清军入关之前，对李

[收稿日期] 2009－10－0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统治思想视野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8BZS003。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自成农民起义军亦如此。早在李自成农民军进占山东之时，孔胤植即授意曲阜世职知县孔贞堪乞降，结果孔贞堪被授“照旧管事委要”。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后，清军攻占山东，孔胤植即上《初进表文》，向清廷表忠心。表文中称颂清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长久，表示“臣等阙里坚儒，章健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距恐后”[3](p.160)。

差不多与孔胤植上《初进表文》同时，顺治元年（1644年），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王朝呈递了《恭陈平定山东十二要策》的重要奏折，其中谈到孔孟之道及对圣裔大宗的优礼问题。他在奏折中说：“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礼应救官崇祀，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士等之封，可卜国脉灵长，人文蔚起……”。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此天下仰以为盛典，后世传之以为美治，万不可迟缓也。”[3](p.160)对此奏，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予以格外重视，并采纳了这些建议。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吏部议覆：“山东巡抚方大猷疏、请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照原阶兼太子太傅。其子兴燮照例加二品冠服。孔允钰、颜绍绪、曾闻达、孟闻玺仍袭五经博士。衍圣公保举曲阜知县孔贞堪仍为原官。其在汶上县管圣泽书院事世袭太常寺博士、应以衍圣公第三子承袭。至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及四氏学录等官、俱照旧留用。管勾、司乐、掌书等缺、听衍圣公咨部补授。从之。”[5](卷九)同年，衍圣公“荫植朝京师，遣官迎劳。入朝，班列大学士上，赐宴，恩礼有加。”[6](p.13307)在孔胤植重新受封为新政权体制下的衍圣公之过程中，就清朝而言，亦可说是象征着其政统得到固有道统的认可；就衍圣公而言，则是表态他们所代表的道统象征，愿意接纳新兴政统的“收编”、优礼。

1645年，清朝向全国再次下“剃发令”，其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5](卷一七)政令刚发出不久，孔家便曾经在先服从薙发令，以示无抗清敌意之后，上疏请求清廷考虑孔家在历史上的特殊性，特准网开一面：“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氏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5](卷二一)身为孔子嫡裔的孔家，以十分委婉的说法，希望清廷在推行全面薙发易服的政策里，能顾及孔子的圣人地位，特准孔家保留“三千年未有之改”的传统服制，以作为装饰新政权“崇儒重道”的样板工具[7]。但就连这样的请求也遭到清廷严厉批判：“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譔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5](卷二一)面对曲阜孔家抬出孔子制礼这杆大旗作为孔府保持中原服饰礼制的理由，清朝以“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这一“无所逃于天地间”的绝对的君臣关系和“一代自有制度”，来对待，并认为“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孔子也会遵从君主服制而不会违背君臣的基本伦理，把孔子及其后代的服制也纳入君臣关系的论述之列。

二、清初对衍圣公的优养与限制

衍圣公孔胤植对清初统治者的一系列效忠活动，迎合了清初统治者标榜尊孔崇儒以完成其统一大业的需要，也为孔府赢得了许多实际的利益。除了清军入关之后顺利袭封衍圣公外，历次帝王的释奠和曲阜亲祀都会给予一定的赏赐，顺治十四年（1657年）六月，又加封衍圣公孔兴燮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声名显赫的鳌拜、尚之信等人则只被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5](卷一一〇)。康熙二十三年（1682年），皇帝亲至曲阜祭孔时，对曲阜的一切“圣物”倍加赞赏，特命孔子后嫡孔尚任等在诗礼堂为之进讲经书，并扩孔林十一顷一十四亩九分[1](卷一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起，更用三年的时间重修孔庙。雍正二年（1724年）起，大规模修缮孔庙，调集十几个州、县官员监修，令其修建之制，比于王宫。用了5年的时间，修成“魏焕崇朋、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灿然一新”的孔庙[8](卷三二至卷三五)。乾隆时期对衍圣公孔昭焕的优礼更是非同一般，孔昭焕自乾隆八年袭爵后，曾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六年（1761年）、二十八年（1763年）、三十六年（1771年，两次）六次入朝，乾隆帝南巡时七次迎接，乾隆帝曾赐其“貂裘蟒服”，赐予《敬胜斋法贴》、《皇朝礼器图》、《曲阜诗卷》，赐给孔府“曲柄黄伞（伞）”、“周范铜器”，赐给其高祖母黄氏题有“六代含饴”匾额。有时在孔昭焕率各博士族人入朝时，还特赐御宴等等[8](卷三二至卷三五)，均见乾隆对孔昭焕之优礼。清初皇帝为了对全国进行统治，在思想上大树孔孟之道为正统，可谓不遗余力。

然而，对于衍圣公的优礼也仅仅来自于优养，对于国家实务，历代皆采取不任实事的政策，如明朝初年朱元璋曾明确表示：“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事也。”[4](卷三一)清初帝王对孔府的赏赐也仅仅局限于祭孔的礼器和规格需求上，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亲祀山东孔庙的赏赐，“以孔林工竟，率族人诣阙谢。上御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入对，命坐赐茶，谕曰：‘汝为先圣后，当存圣贤心，行圣贤事，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汝年方少，尤宜勤学读书，敦品励行，与汝族人相劝戒，相砥砺，为端人正士。’广棨顿首谢。赐松花江石砚及锦币，赐宴，遣归。十三年，世宗崩，入临。高宗复召入对，以覃恩赠父继濩如其爵。乾隆三年，上幸学，召广棨陪祀。献亲耕耤田颂、视学大礼庆成赋。四年，朝京师，祝上万寿。会举经筵，令侍班，因奏请着为令。六年，疏劾曲阜知县毓琚不职，毓琚亦讦广棨居乡不法，下巡抚按治，上原广棨而遣毓琚。”[6](p.13309)频繁的赏赐中孔门后人的外任却很少提及，同时要求衍圣公以诗书传家，时时不忘教诲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孔府必须对君权的服从，雍正二年（1724年）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及崇圣祠时，“上御太和殿受贺孔继溥率五经博士五氏后裔祭酒司业率国子监官员进士举人荫贡监生等进表谢恩，上召孔继溥等十人入见谕曰：‘尔等是圣贤后裔，与众不同，必心为圣贤后裔之心，恪守先圣先贤之训，方为不愧朕诣学大典。尔等远来，特行召见，面谕尔等，慎修厥德，以继家声。’”[9](卷七四) 雍正三年（1725年），衍圣公孔传铎请颁赐《圣谕广训》、《朋党论》二书，雍正帝温旨谕之谕曰：“我圣祖仁皇帝教育群生，御制上谕十六条，期以厚民风而端习俗。朕仰承先志，推衍发明，着为广训，使愚氓易晓。凡兹作述之间，悉本先师孔子之道，以为是训是行之本并无一语出乎圣教之外也。卿为至圣后裔，果能祗遵祖训身体力行，则修身齐家之道，化民善俗之模莫大乎是。且植党为圣人所深戒，向来孔氏子孙从无趋附匪党之事。所请二书不必颁发，卿其恪遵好学，力行知耻之训，能光家乘即广国华，勉之慎之！”[9](卷七四) 作为道统象征的衍圣公主动要求宣扬康熙帝的《圣谕广训》，实则表示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道统，展现了道统向治统的完全屈服。乾隆八年（1743年）在乾隆帝给孔昭焕的札谕中，也是令其“统率宗姓，朝夕训励，申伤教规，讲肄经学。如有不守规戒，恃强越分，朋比为奸，干犯法度者，轻则送地方官查处，重则据实指名参奏，依律正罪”。

由乾隆六年（1741年）衍圣公与曲阜知县互讦案，可窥见清朝既需厚待孔子后裔，又设法加以约束的情形。是年九月，兖州府曲阜县世职知县孔毓琚呈：“为世爵鬻爵卖官，乱宗剥民，欺君罔上，万民含恫事。钦惟圣朝尊崇至圣，恩及苗裔，袭封公爵，待以殊礼，自宜守道崇德，读书好学，以遵祖训，以答国恩，不谓卖官鬻爵，贪财纳贿，剥民乱宗，鱼肉户丁，弁髦王章，蔑弃圣教，如今之衍圣公孔广棨者。”[10] 根据户部侍郎周学健的奏折，可以判断孔广棨不法属实，理应推究，“臣伏思，本朝尊崇至圣，旷典殊荣，超越前古。衍圣公自应益矢敬慎，仰报国恩。今孔毓琚所揭情由，虽属参后具揭，例不准行，然使衍圣公孔广棨平素果能整躬砥行，屏绝夤缘，严率属下人等，毋许依藉声势，营私舞弊，派累小民，实无譬议之处，孔毓琚即欲列揭，亦何以为词。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况孔毓琚见闻甚近，亦未必全属子虚，臣实不能保其必无此事。如果所揭有据，是孔广棨不惟有负圣朝尊崇之典，抑且有玷至圣家声。按其情事，固应推究以彰国常。”然而，最后的处理是按照鄂尔泰的奏折：“臣等细按情事，固应推究，但揆之我皇上尊崇至圣、保全圣裔之盛心，稍有未慊。应如该侍郎周学健所奏，仰请皇上严加训饬，俾其读书砥行，动遵礼法。凡有题补员缺，屏绝夤缘，一秉至公。所有空衔札付，遵例停止。务期整躬率下，教导族人，以承先圣诗书之泽，无负皇上教诲成全之意。”“乾隆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钦此。”[10] 对衍圣公警告训饬了事，可见清朝时期皇帝对衍圣公恩渥倍加，孔府屡受宠隆，势力猛增。一个是利用圣裔，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统治，一个是靠上皇帝保障和发展自己的特权。双方配合默契，相互利用。

三、衍圣公参与祭孔与清初政权的道统化

清初的祭孔活动也都积极邀请衍圣公参与祀礼，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视学释奠于孔子，“前期，衍圣公率孔、颜、曾、孟、仲五氏世袭五经博士，孔氏族五人，颜、曾、孟、仲族各二人，赴都。暨五氏子孙居京秩者咸与祭。”[6](p.2534) 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圣祖仁皇帝视学释奠于孔子，先期遣官取衍圣公孔毓圻及孔、颜、曾、孟仲五经博士并族人赴京陪祀观礼。”[12](卷一一) 衍圣公在清初释奠祀典的不可或缺，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举行视学释奠大典，恰逢孔传铎病，雍正帝谕礼部：“朕于三月内、举行视学释奠大典。定例衍圣公。应行陪祀。闻孔传铎有疾、且值守制之初。可令伊子弟一人来京、代伊行礼。”[12](卷一五) 《明史》中有一段话把孔子家庙和国家孔庙的功能作了区别：“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13](p.1296) 孔子后裔自古以来就是祀孔仪典中必备的血缘角色，历代君主为了宣示祭祀的正当性，延续或访求孔门圣裔皆为当务[14](p.198)。衍圣公代表孔族接受清朝以官方地位参与祭孔祭典，则是政统与道统的一种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化祭祀典礼，成了清初政权中原道统化的仪式政治。

与明代相比较，清代孔府的政治殊荣地位更形拔高，康熙、乾隆二帝的多次南巡祭孔及恩赏，使孔氏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和声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乾隆时，据传协办大学士、总纂《四库全书》的纪昀曾亲笔给孔府书写了一副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清朝初年的孔府，政治上是个“与国咸休”、“同天并老”，凌驾于一方的独立王国，经济上是“安富尊荣”的贵族府第。但在土地和户人的钦赐方面，却仅仅维持了明代的规模，而鲜有增添。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孔昭焕疏言：“皇庄户丁蒙恩免役，历来地方官额外杂派，每事调剂非易，请酌留五十户，余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应役。”上谕曰：“昭焕疏言皇庄，此必沿前代旧习，然亦止应称官庄。子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诈，无臣而为有臣。’昭焕可谓不能读其祖书矣。此时丁银已停征，地方官安得更令百姓应役？且取役何事？若为朕东巡修道，则皆发帑雇役，初未累百姓。朕展谒先师，衍圣公督令庙户除道清产，理所应尔，岂当转庇庙户，并发帑雇役亦不肯应耶？”下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以昭焕年少，归咎继汾及其兄继涑，皆谴黜[6](p.13309)。故清代与前明较之，经济优待方面也是加以限制的，其政治象征色彩则更浓烈。

在清初皇权政治的高压之下，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匍匐于皇权脚下，实际上展现了现实之中治统对道统的绝对主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圣祖车驾发自京师，衍圣公孔毓圻率五经博士孔毓埏等迎驾，至齐河恭请圣安。谕：衍圣公孔毓圻归待于境。毓圻等遵旨辞归遣太常寺。七日戊寅，幸曲阜，衍圣公孔毓圻率博士孔毓埏等诸职官及其族人五氏子孙年十六以上、山东巡抚张鹏率司道以下及本处守令属员、登州总兵官林率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沂州协守都督佥事霍宗维鼐等，于东郊跪迎，士庶观者以数万计。”[11](卷一一)亲祭孔庙后，又于诗礼堂赐衍圣公孔毓圻御制《过阙里诗》，孔毓沂万分激动地说：“御墨精工，备极其妙。臣得此永为传家世宝，不胜感激之至。”[15](p.1255)可见衍圣公对皇帝之尊崇。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孔毓圻修《幸鲁盛典》上表曰：“臣性资弇鄙，问学空疏，守祀祖庭率履，恐贻陨越。祗承休命编摩，未敢怠遑，虽复暝写晨书，不无挂一漏万，藉一蠡以测海，岂能扬扢鸿猷，握寸管以窥天?”[16]对于康熙帝的诚惶诚恐可见一斑。

清初帝王道统形象的论述，衍圣公孔传铎的表述更有深意，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十六日孔庙重修告竣，孔传铎在为文庙工竣圣主恩隆谨率族属俯伏阙下恭谢天恩事奏折中说：“钦惟我皇上德隆今古，治迈唐虞，作君作师，弘百王之道统，惟精惟一，契歷圣之心传，德教覃敷，文思广被，兹荷帝恩之优渥，欣瞻文庙之聿新，特发帑金重施建造……臣欣沐帝泽，生生世世难名浩荡之仁，感戴皇恩，子子孙孙莫报高深之德。”[11](卷一一)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也承认，帝王“作君作师，弘百王之道统”，也要“感戴皇恩”。乾隆三年（1738年），“上幸学，召广荣陪祀。献亲耕耤田颂、视学大礼庆成赋。”[6](p.13309)为帝王歌功颂德。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诣先师庙释奠时曾谕衍圣公孔照焕曰：“先师修道立教，天下万世之人服习圣训，咸有以自善其身，况为其子孙者乎?卿以宗裔，奉祠绍封，列爵既优崇矣。当思渊源何自，夙夜敬勉，亲师向学，以植始基；慎行谨言，以培德器。循循诗礼之教，异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党，俾当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传于勿替，匪徒章服之荣已也，岂不休哉！其祗遵罔斁。”[17](卷三九九)明确告诫衍圣公优越的地位是帝王赋予的，是帝王光耀了孔门。另外，翰林院编修徐元正在《圣驾幸阙里颂》：“皇帝于孔氏，既崇其先，厥后宜赉，特赐衍圣公及博士裘各一袭，诸子姓白金各五两，尽复曲阜一岁田租，于是东鲁父老覩斯盛者，莫不欣踊叹嗟，佥称圣天子重道崇师推恩及物，旷古未有。此治与道偕隆，君与师兼作，盖非孔氏一家之私荣，直邦家之庆而史册之光也。”[16](卷二六)亲祀孔庙，本是为清初政权蒙上道统色彩，而在士人眼中则是孔府之荣幸。这实际把清初帝王的道统地位置于孔子之上，实则是治统高于道统，是道统对治统屈服的象征。

四、结　语

中国封建社会，中华文明所及之处，都有孔庙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祭孔从孔族家祭成为一项官方祭典，孔裔从孔门后人成为衍圣贵族，都与现实政治存在着联系。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此重视祭孔、礼遇衍圣公，更显得别有深意，主要原因是清初满洲政权统治中原的客观需要。清初政权的“夷狄”身份，对于其统治中原的正当性，构成严重的障碍。清初对祭孔及孔门后裔的优待，衍圣公参与的祭孔祀典集家庙祭祀和国家祀典于一体，实际上是国家祀典欲借助孔庙家祀来达到其正当性，以此来宣称自己是真正继承中华文化道统的正统中国，从而把夷狄之君纳入传统中国王朝的正统谱系，以暗示本身也同样具有统治正当性。所以，优礼衍圣公正是因其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宗教性、文化性等多重特征，成为清初满洲政权巩固的手段，生存的依据。应该说，优礼衍圣公所要表达的，是对中原儒家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也是强化统治正当性的象征之一。作为孔门在现实政权中的地位象征，原则上以嫡裔继承的“衍圣公”封建官衔，与国家权力对于孔子的尊崇密切相关，与祭孔活动在象征意义上本质无异。然而，衍圣公除了在每年祭孔活动里扮演重要角色，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恩赏之外，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其实质仍然是作为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参　考　文　献]

[1][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M].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2]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鹏程,王厚香.天下第一家——孔子家族的历史变迁[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4][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潘志群.清初的统治正当性问题[D].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8](乾隆)曲阜县志[M].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9]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M].

[10]乾隆六年衍圣公与曲阜知县互讦案[J].历史档案,1995,(3).

[11]钦定四库全书.山东通志[M].

[12]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1998.

[15]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钦定四库全书.幸鲁盛典[M].

[17]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系燕山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晓校]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